

論連橫「地方」書寫中的兩種方式與寓意： 以〈臺灣史跡志〉、〈臺南古蹟志〉為觀察核心

江寶釵*

摘 要

本文以「地方」觀察連橫〈臺灣史跡志〉和〈臺南古蹟志〉書寫的兩種方式，探析其寓意。二志的地景敘事無論從創作緣起、修辭技巧、內蘊意識等各方面，皆可以溯源至《水經注》與《洛陽伽藍記》。他取法前人身歷其境或診視山水的書寫技藝，載錄臺灣史跡、臺南古蹟，其書寫蘊含怎樣的動機？此一敘事背後隱含著怎樣的地景自身或時代特殊背景而產生的意義？就人文地理學的角度觀之，在社會／地理的基礎上，事物自有其特殊秩序，在人的生活中形成記憶，並銘刻意義，此即地方感。惟，環境變遷造成地方的「流動性」——當史跡、古蹟隨著時間、市區改正或其他都市新地景的興起而圯壞之時，人的記憶以及因之產生的事物之意義，也將隨之而日漸消亡，地方感亦為之改變。則連橫此二志的書寫正是 Tim Cresswell 所說的「地方再現」，重建日常生活在一個「地方」的實踐，緣著書寫之再現，「地方」在消失的記憶中得以被留住。而如何使得臺灣／臺南地景經典化，化入文人雅士創作的筆墨，進一步促使他去追求地景的歷史書寫，最後則依皈於祖國的「文化大傳統」。

關鍵詞：日治時期、連橫、臺灣史跡、臺南古蹟、水經注、洛陽伽藍記

*臺灣中正大學中文系暨台文所合聘教授；傅爾布萊特基金會美國哈佛大學東亞系訪問學人（2010-2011）。

一、前言

根據連橫的自述，他在二十世紀初期就決心為臺灣作史。¹一〇年代，他展開一連串的旅行。遍歷海峽兩岸，旁蒐博采，其過程裡遇見諸多文獻資料，有的另有用途，期諸他日；有的則係為撰史而準備，卻並未派上用場，後來再作補充，纂輯成書者。在臺灣省文獻委員會編印《連雅堂全集》裡，《台灣語典》記錄臺語文字訓詁；《詩乘》載述詩人、詩歌作品；至於《雅堂文集》裡的〈臺灣漫錄〉、〈臺灣史跡志〉、〈臺南古蹟志〉寫作臺灣各種名物、地方，都係出以筆記遺墨形式的臺灣歷史。〈臺灣漫錄〉一如其名，為天南地北之雜談漫錄。兩志經過連橫自編、後人整理重編，具脈絡性，圈限了一定的範疇，以地方史跡、古蹟的地理空間為主要內容，係寓有作者意圖（author's intention）的創作實踐。連橫如此區分《臺灣通史》所載與二志之不同，在〈史跡志〉的體例裡，他說道：

壇廟、祠宇、書院、寺觀，具載《臺灣通史》，唯擇其有關史跡者言之。²

引文中，「書院」部分見諸《臺灣通史》卷十一〈教育志〉所附「臺灣書院表」，至於「壇廟、祠宇……寺觀」等，則可於卷十〈典禮志〉所附「各府廳縣壇廟表」中索檢，包括當時台南縣在內。但前揭二表頗為簡略，不足載明其史跡緣由，因而乃有二志的寫作，同時，二志也有裨補《臺灣通史》、提供中央纂修歷史參考之用的意義。

如果細膩的追索，我們發現，連橫前述幾本有關臺灣的筆記體作品，都有他心儀楷模的對象。如《台灣通史》仿司馬遷《史記》，《台灣語典》上溯揚雄《方言》，《詩乘》為歐陽修《六一詩話》以降的中國詩歌理論史，而〈臺灣漫錄〉、〈臺灣史跡志〉、〈臺南古蹟志〉更形如魏晉南北朝筆墨，特別是〈臺灣史跡志〉、〈臺南古蹟志〉，二者在各自撰述的體例或形制上，似皆受到酈道元《水經注》、楊銓之《洛陽伽藍記》一定的影響，於山水描景上似取法前者，而人文設施、家國情感上的書寫則近於後者。

連橫〈史跡志〉與〈古蹟志〉的書寫蘊含怎樣的動機？如何看到《伽藍記》、《水經注》的留痕？其以及我們應該如何看待連橫二志敘事背後的地景史觀？筆者認為這兩志的書

¹ 本文的撰成，黃清順博士曾協助補益有關《水經注》的文獻；又蒙兩位匿名審查人提供的寶貴意見，本文乃得據以修改，特此呈上感謝之意。

² 連橫《雅堂文集·跋》云：「若夫壇廟、祠宇、書院、寺觀，俱載臺灣通史，茲不復贅。連橫跋。」似乎意謂著《台灣通史》有載，則二志不贅。實則不然。文廟見於〈古蹟志〉，亦見於《台灣通史》。且二志裡壇廟、祠宇、書院、寺觀不斷出現，並非不贅敘。因而，筆者採體例中的說法，而不取跋中所言。連橫：《雅堂文集》（南投：臺灣省文獻委員會，1992），頁252。

寫方式正呈現了當代學者廖炳惠所指出的，在臺灣歷史的動態發展過程，它在接受不同階段的殖民經驗之後，與現代性產生多元的交錯，³其回應之一即「單一現代性」，廖氏用此指稱一種情境，即被殖民者在殖民政府的壓抑統治下，激發出孺慕祖國而有回歸祖國文化大傳統的行動。這種回歸行動的發微，不能不溯及當時的時代背景。一〇年代，回應西方與東洋帝國之夾擊，引動了「整理國故」的思維，中國出現五四運動（1919），胡適強調傳承有年的文獻遺產不能稱之為「國粹」，應中性化地稱之為「國故」。而所謂的國故，不只是包含向來被視為有價值的經典傳統，更應該包括不入流的古代各類稗官野史、街談巷議、三教九流的口傳或書寫文獻。⁴二志中蒐錄了不少傳統被視為「不入流」的作品，其受到整理國故運動的影響，自不可避免；另一方面，二、三〇年代在臺灣展開的新舊文學論爭到臺灣話文運動，都曾針對文言漢文是否能夠做為書寫語言展開辯證，連橫的態度從捍衛文言漢文，最後又轉變為「世界語」亦無不可，但他的重要論述，幾乎都聚焦於前者，⁵有關世界語僅輕輕帶過，則二志與連橫其時的論述形成何種關係？

回顧有關連橫的研究，固然不多，於〈臺灣史跡志〉、〈臺南古蹟志〉尤其相對殊少，因而，本文擬自二志的內容、比較，底下分三節次第考察兩志對臺灣／臺南書寫的策略，如何取法中國古代地理經典的書寫，在殖民統治的壓抑下，其敘事所隱含的地方精神與文化意義，如何向文化祖國的大傳統回歸。

二、地方的書寫技藝暨其文化意義

³ 廖炳惠所指出的殖民現代性至少有四種，依次為：官檢或自我官檢造成文人的抑言不談，是為壓抑性的現代性；被殖民者孺慕祖國而有回歸祖國大傳統的想像，是為單一現代性；在殖民者統治下，被殖民者亦可能自行尋求新的出路，發展出不中不西、又中又西的另類現代性，形成抗衡傳統；此外，他們也得以利用殖民地特有的多元文化論述底下的資源，發展多元現代性（multiple modernity）。此對「不同的現代性」的解析，可能更適用於強調社會脈絡的差異、得以凸顯臺灣歷史情境在縱的時間所造成變化之特殊性，身分的雙重性及文化地理的邊緣問題，以及因此而獲致的多元文化傳承與歷史經驗。本人在其他文章中曾就此有所討論，詳廖炳惠：《臺灣與世界文學的匯流》（臺北：聯合文學，2006），頁8。又，所謂的「官檢」，意謂官方對作家言論的控制。

⁴ 參胡適：〈新思潮的意義〉，「整理就是從亂七八糟裏面尋出一個條理脈絡來；從無頭無腦裏面尋出一個前因後果來；從胡說謬解裏面尋出一個真意義來；從武斷迷信裏面尋出一個真價值來。」原載《新青年》第7卷第1號，1919年12月1日。後收錄於《貞操問題（胡適文存／第一集，第四卷）》（臺北：遠流，1994），頁123。如果就這個層面而言，連橫二志的書寫顯然不符此一運動的精神。但就拾掇地方文化傳統而言，則連橫的作為就可以說是雖不中，亦不遠矣。

⁵ 參連橫：《雅言·四六》（南投：臺灣省文獻委員會，1992），頁21。相關論述則見江寶釵：〈日治時期臺灣文人對語言使用的主張暨其平議〉，《東吳中文系學報》26期（2013.11），頁245-264。

連橫的二志見於《雅堂文集》，原是在《臺灣日日新報》中以專欄的形式刊登的文章。「婆娑洋聞見錄」稍作改動後，其大部分收錄於〈臺灣史跡志〉、〈臺南古蹟志〉，少部分編入〈臺灣漫錄〉。〈臺南古蹟志〉則刊登兩處，一是 1911 年前半年刊載於《臺灣日日新報》的〈臺南名勝志〉，二是 1924 年迄 1925 年發刊的《詩薈》，後並收入《文集》之中。筆者比對後，發現《臺灣日日新報》所刊為《詩薈》、《文集》的初稿，內容幾乎相同。〈臺灣史跡志〉則不見於《詩薈》，所描寫場所也與〈古蹟志〉全不重疊；二志皆著墨臺南，但〈史跡志〉多為舊台南縣的向外拓墾區，也著墨壇廟，但也有的談一個區域在「面」的興衰發展，如曾文溪、竹溪寺等，而〈古蹟志〉則幾乎都集中在舊台南市，而且是明清時期人的「景點」；復次，目前見收於《雅堂文集》的〈史跡志〉，較日治時期刊載條目多出八十八條，是極可能寫作於三〇年代者。由是，可證實二志實有不同。

連橫在《雅堂文集·序》中曾有以〈臺南古蹟志〉併入〈臺灣史跡志〉的想法，「余既撰《臺南古蹟志》，因念偏囿一隅，未及全局，乃作此編，以為讀書稽古之助。俟殺青後，當將《古蹟志》併入於內。」⁶言雖如此，但並未落實，其原因很可能是前者為連橫撰寫故里臺南，後者則是將臺南也含納在內的臺灣全島，無論在情感、筆觸、地理規劃上都有所不同。且後續增補擴充後的〈史跡志〉篇幅甚鉅，〈臺南古蹟志〉一旦併入其中，其面貌勢必變得模糊。也許是為了維持故鄉臺南的主體性，他最後不僅未將二志合併，尚且分開標目。而如同《台灣語典》係為《三六九小報》寫的「台灣語講座」專欄，連載未完，1957 年由其子連震東重予整理、陳漢光校訂出版；二志亦依此模式，後由臺灣省文獻委員會編輯，廁入《雅堂文集》卷三，並仍連橫舊例，獨立為兩志。而考其書寫方式，我們可以看到若干《伽藍記》、《水經注》的留痕。

《水經注》四十卷因北魏晚期酈道元注《水經》而得名，該書描述一千多條大小河流地貌、地質礦物、動植物、歷史遺迹、人物掌故、神話傳說、碑刻墨跡和漁歌民謠。清代王先謙認為酈道元注《水經》的目的在於「因水以證地，即地以存古」⁷。清人錢大昕發現漢初分封的侯國，於班固的《漢書》中已無完整的記載，但《水經注》裡竟能索得十之六、七⁸。與《水經注》被視為北朝文學雙璧的則是北魏楊銜之撰寫的《洛陽伽藍記》（以下簡稱《伽藍記》）成書於東魏孝靜帝時，集歷史、地理、佛教、文學於一身，保存了當時的文獻掌故，更具備高度的文化底蘊。《四庫全書》繫二書於地理類，一寫北朝國都洛陽，一寫大江南北，揆其內容，都在寫空間與景觀。至於學者將《水經注》、《伽藍記》的

⁶ 連橫：《雅堂文集》（南投：臺灣省文獻委員會，1992），頁 189。

⁷ 王先謙合校本：《水經注·序》卷十八（北京：北京出版社，2000），頁 43。

⁸ 錢大昕著，陳文和點校：《潛研堂文集卷十二·答問九·諸史》指出：「漢初功臣侯者百四十餘人，其封邑所在，班孟堅已不能言之。酈道元注水經始考得十之六七。」（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1997），頁 180。

地理空間書寫集約為兩種方式：身親歷之與診視山水。《伽藍記》之親歷史蹟，固不待言，而《水經注》之躬臨山水，歷來窮究「酈學」⁹的學者，也已多所證明，如吳天任《酈學研究史》摘舉實例云：

綜觀《水經注》全書，述其親身訪歷、勘察實跡者，略舉數例：如卷三「河水經」「又東過雲中楨陵縣南……」下注云：「沿路惟土穴出泉，挹之不窮。余每讀『琴操』，見琴慎相和雅歌錄云：『飲馬長城窟』，及其扳陟斯途，遠懷古事，始知信矣，非虛言也。」此因讀古歌謂其地有飲馬窟，初尚不信，及親身扳陟，始知其實，脈水考文，同時並重……自臺西出，南上山，山無樹木，惟童阜耳。」因實地觀察而證明所歷之山，乃無樹木，但一禿阜，若非親歷親見，何由知之。

10

以上，不論雲中楨陵縣抑或陰山講武臺，酈道元總在親歷其境之後，提出相關的檢視。¹¹

就前述身親歷之的空間書寫意義而言，人文地理學家 Tim Cresswell 的說法或許可以提供我們思索的脈絡。Tim Cresswell 認為「地方」是一種觀看、認識和理解世界的方式，從人與「地方」之間的種種關係，發現意義和經驗的世界，使之進入文化的範疇。¹²酈道元生當中樞南移的世變之際，從而有江南佳山水的出現，他遂以自身的游歷經驗以疏注水經為名，不時呈現對其自身之空間感的書寫。除了知性文字的勾陳與探討之外，往往亦將相當的人文經驗灌注其中，這使得他對該地描述被賦予一種「地方關懷」的主觀情感。這樣的情境也呈現在連橫兩志的書寫之中。易言之，出身府城臺南、又寓居臺中、臺北的連橫，在處理其「家鄉」、「寓居」的史跡或史蹟資料，經營其臺灣或府城敘事，會一定程度聯結其在地空間經驗，此經驗又透過內在的「心境、思想和感覺」¹³而轉化成具有主觀情感依附的「在地記憶」，而有別於客觀地景（landscape）書寫。

⁹ 正如霍華亮、劉鵬：〈酈道元生平簡介與《水經注》〉所云：「《水經注》是西元6世紀北魏時酈道元所著，是我國第一部以記載河道水系為主的綜合性地理著作，在我國長期歷史發展進程中發生過深遠的影響，自明清以後不少學者從各方面對它進行了深入細緻的專門研究，形成了一門內容廣泛的『酈學』。」（收入《安徽文學》4期（2009），頁35。）

¹⁰ 吳天任又舉了下文「同卷經注又云：『余以泰和十八年，從高祖北巡，屆於陰山之講武臺』此地不贊，詳《酈學研究史》（臺北：藝文印書館，1991），頁23-24。

¹¹ 研究《水經注》最深最力的大陸學者陳橋驛才會得出以下的結論：「酈道元撰寫《水經注》所運用的各種方法之中，最突出的特色是他的勤勉的野外工作。他自己在〈水經注序〉指出了他的寫作方法是『訪瀆搜渠，緝而綴之』。真是一點不假。」陳橋驛：《酈道元與《水經注》》（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頁55。

¹² Tim Cresswell 著，徐苔玲、王志弘譯：《地方：記憶、想像與認同》（臺北：群學，2006），頁21。

¹³ 此處借用段義孚（Yi-Fu Tuan）：《經驗透視中的空間和地方》（Space and Place: The Perspective of Experience）一書中「緒言」的說法，參潘桂成中譯版（臺北：國立編譯館版，1998），頁3。

這種在地的主觀記憶，又往往嵌插著連橫的家國興亡感，而連橫在受到《水經注》啟迪之外，也有著《伽藍記》影響的迴光。《伽藍記》寫人文興築，分城內、城東、城西、城南、城北五卷歷數北魏洛陽城的伽藍（佛寺）的緣起變遷、廟宇的建制規模及與之有關的名人軼事、奇談異聞。箇中所述，實無一非作者穿梭其間之清晰履跡，更有著時空流動的特殊情感。根據作者自道，他曾於魏孝莊帝永安年間（528-529）官奉朝請，目睹帝都洛邑極盛時的景觀。時隔約二紀，孝靜帝武定五年（547）復因行役重覽洛陽，觸目「城郭崩毀，宮室傾覆，寺觀灰燼，廟塔丘墟。牆被蒿艾，巷羅荊棘」，¹⁴故撰斯記。推其成書，應在北魏滅亡，東西魏分裂（534）之後，楊銜之明寫佛寺盛衰，實則借以詳述都城地理，反映國家興亡，寄託故國哀思，寓含著黍離麥秀之悲與治亂訓鑑。正《魏書》之曲筆，考史志之闕誤，於歷史地理研究佔重要地位。連橫所經歷的時代景況與楊炫之固不盡相同，惟〈古蹟志〉作於臺灣改隸日本之後，當時殖民政府厲行市區改正。連橫追思往昔，綴拾舊聞掌故，書寫的對象也是人文興築，以之裨補其個人所撰述之《臺灣通史》的不足，字行間不忘考證史志之載述，寓含深沉的世變之警惕，家國之深思，其最明顯者為後文之「馬兵營」一則，揆其意含，實與《伽藍記》無異。詳後論。

在身親歷之以外，《水經注》另有一種書寫的方法，即診視山水。一般而言，地理空間通常指涉區位（location），故就外來者的角度以觀，原只是一個辨識方向與區域的名詞或定位點。例如：旅人看到雞籠山與鯤鯓時就知道臺北與府城要到了。另外，空間也會純粹被用來指涉一個地方，與個體在地生活經驗無關，也不含帶主觀感情，這種情形的理解，固然能講述得頭頭是道，但缺乏實地體受，因此是以「知性」文字和「客觀」語言的縷陳來建構整篇文獻，究其實際，並沒有地方感，也就是沒有主觀經驗和個人情感上的依附。不過，善寫者往往能巧妙彌縫此一盲點而做到如臨其境的效果，這是因為作者靈活挪取他人閱歷以化為己用，佐以文人想像的充分發揮，從而寫出宛如在場的文學作品，這或可另稱之為「案頭山水」。在中國，「案頭山水」是一個行之久遠的書寫傳統。不只是文人創作可以從繹解典籍、採擇文獻中獲得題材，也可以沿襲他人作品中的內容，如李白寫下千古名作〈蜀道難〉，他自己是否「親蒞蜀道」，則恐怕大有疑義。¹⁵這種狀況喻之於題畫詩就

¹⁴ 楊銜之著，楊勇校箋：《洛陽伽藍記校箋》（北京：中華書局，2006），頁1-2。

¹⁵ 如羅聯添說：「李白除開元十三年（725），二十五歲經三峽，乾元一、二年（758、759）流放夜郎遇赦，往返三峽外，一生似不曾踐履自青泥嶺至劍閣一段路程。其所描述蜀道之艱險，山川景物之奇特，部分出於想像、推測；大部分係取舊籍……內容取材多據楊雄《蜀王本紀》、張載《劍閣銘》、暨左思《蜀都賦》。其中「劍閣崢嶸」一節辭意幾與《劍閣銘》無甚差異。惟此等取材經李白變化融裁，增益懸想，遂成傑構宏篇。」參〈李白《蜀道難》寓意探討〉，《唐代文學研究》（廣西壯族自治區出版）00期（1994年），頁247-248。惟劉大杰則持不同意見，他在《中國文學發展史·中卷·盛唐詩人與李白》表示李白遊蹤遍南北：「他看得多，體會得深刻……三峽的猿啼、天姥山的雄奇、蜀道的驚險、四萬八千丈的天台山，天山飛來的黃河水，一一出現在李白的筆下。」（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新二版，頁521）。另外更為著名的例證，則是韓愈。考韓退之一生足履未曾蒞臨桂林，

更清楚了。作詩題畫寫的是觀畫所見的山水，未必是自身行履所至。這些題畫詩被收入詩集中出版，卻被當作真正的山水詩閱讀。「案頭山水」之大家，要以被視為中國山水遊記先導的酈道元《水經注》為最。而此一書寫的策略，也或多或少見諸連橫兩志。

《水經注》因疏解內容所牽涉的幅員遍及大江南北，作者勢必不能一一親臨見證，故其闡述地景遺跡，往往援引前人典籍閱歷以作為說明，如《水經》卷九〈清水〉曰：「（清水）東北過獲嘉縣北」，酈《注》「獲嘉縣」云：

《漢書》稱，越相呂嘉反，武帝元鼎六年，巡行於汲郡中鄉，得呂嘉首，因以為獲嘉縣。後漢封侍中馮石為侯國。縣故城西有漢桂陽太守趙越墓，冢北有碑。趙字彥善，縣人也，累遷桂陽郡、五官將、尚書僕射，遭憂服闋，守河南尹，建寧中卒。碑東又有一碑，碑北有石柱，石牛、羊、虎，俱碎，淪毀莫記。清水又東，周新樂城，城在獲嘉縣故城東北，即汲之新中鄉也。¹⁶

酈氏上面的注解，乃考索史籍而來，雖則闡述詳盡，卻是知性的客觀鋪陳，並未帶有情感的依附，其地方認同感自是闕如。再者，如《水經注》卷一〈河水〉提及「新頭河」云：

釋法顯曰：度葱嶺已，入北天竺境。於此順嶺，西南行十五日，其道艱阻，崖岸險絕，其山惟石，壁立千仞，臨之目眩，欲進則投足無所。下有水，名新頭河。昔人有鑿石通路施倚梯者，凡度七百梯，度已，躡懸經過河，河兩岸相去咸八十步。九譯所絕，漢之張騫、甘英皆不至也。余診諸史傳，即所謂罽賓之境。有磐石之陞，道狹尺餘，行者騎步相持，絙橋相引，二十許里，方到懸度。阻險危害，不可勝言。¹⁷

考察酈氏仕宦北魏的經歷，其生平主要在華北黃淮流域活動，足跡不曾逾越國境以外，因而他對北天竺罽賓之境的描述，只能「診諸史傳」而來，從而對該地「崖岸險絕」的危道形容——所謂「行者騎步相持，絙橋相引……阻險危害，不可勝言」云云，究其實際，或者巧挪他人形容，間或加諸文人想像在內，並不是自身體驗下的地方記憶。相較之下，酈氏所援引的法顯傳記之言，因法顯親至西土「佛國」，故對葱嶺的描述，是有著親臨其境

其〈送桂州嚴大夫同用南字〉有「蒼蒼森八桂，茲地在湘南。江作青羅帶，山如碧玉簪」（《全唐詩》卷344）之名句。

¹⁶ [北魏]酈道元原著；陳橋驛、葉光庭、葉揚譯註：《水經注·二·汾濟之水》（臺北：臺灣古籍，2002），頁401。

¹⁷ 同前註，頁8。

的「在地」記憶，故所謂「壁立千仞，臨之目眩，欲進則投足無所」云云，其真實度，令人動容。《水經注》中，相同的情況，還有卷三十七所描述湖北宜都的「清江」（當時稱之「夷水」）：

夷水又徑宜都北，東入大江，有涇、渭之比，亦謂之佷山北溪。水所經皆石山，略無土岸。其水虛映，府視游魚，如乘空也。淺處多五色石，冬夏激湍飛清，傍多茂木空岫，靜夜聽之，恆有清響。百鳥翔禽，哀鳴相和，巡頽浪者，不覺疲而忘歸矣。¹⁸

上引這一段頗為生動的文字裡，諸如「府（俯）視游魚，如乘空也」、「冬夏激湍飛清」、「靜夜聽之，恆有清響」等等形容描繪，都營造出如臨其境的修辭效果，令讀者悠然神往。事實上，這一段文字的光采，如郝志群所指出的，連疏解酈《注》的清末學者、道地的宜都人士楊守敬（1839～1915）都為之流眄，將之用為顏其藏書閣之名的憑藉。¹⁹

然而，我們也當知道，今之湖北古代略分「荊」、「江」二州，南北朝時候，隸屬南疆，故酈氏對宜都夷水的描摹，只能如前所述，係「診諸史傳」而來的，故王允亮明指出當時南北對峙，酈道元一生足跡未到過南朝，無法實地考察南方山水。於是，南方文獻相當程度地裨益了《水經注》的成書，尤其是對他所敘寫的南方山水，「具有填補知識空白的作用，彌補了他不能親自到南方進行考察的缺憾。」²⁰

連橫撰寫〈史跡志〉、〈古蹟志〉，也會觸及非其經驗所及的空間景觀，這時候，他所使用的，也便是所謂的「診視山水」，如酈氏之夷水美文巧妙地挪用他人的敘述，益以其個人巧思於其內的「再創作」。在這部分，由於缺乏「在地情感」的體驗，故對其空間認同也就付之闕如，從而相關的地景描述，也就主要著墨在文獻的考掘、爬梳、客觀環境的描繪與詩詞的徵引之上。箇中呈現的意涵，自與「經驗」過的地方記憶有別。酈氏未有南朝經驗，連橫則無東台履跡，如〈史跡志〉中載「花蓮港原名回瀾港，以潮水至此而回也」²¹、「羅東在宜蘭之南。《噶瑪蘭志略》謂：番語呼猴曰『老黨』，此地有石如猴形，故名；譯為羅東。」²²等等，皆為考述之詞。另一個有力的證據則是在紅頭嶼裡這樣寫道：

¹⁸ 同前註，頁1609。

¹⁹ 同治六、七年（1867～1868）間，楊守敬編著過兩部金石學著作，分別為《激湍飛清閣評碑記》和《激湍飛清閣評帖記》。書名中的「激湍飛清閣」即楊守敬在宜都家中的藏書閣名，其由來顯然源於上引酈書那一段精彩的描寫。郝志群：〈關於《水經注疏》始撰起因及時間的探討〉，《文獻》3期（1995），頁203。

²⁰ 王允亮：〈《水經注》與南方文獻研究〉，《中國文學研究》3期（2010），頁39。

²¹ 連橫：《雅堂文集》（南投：臺灣省文獻委員會，1992），頁213。

²² 連橫：《雅堂文集》（南投：臺灣省文獻委員會，1992），頁214。

紅頭嶼在恆春海中。光緒三年，始入版圖。按夏獻綸臺灣輿圖，謂嶼在恆春縣東八十里，孤懸荒島，番族穴居，不諳耕稼，以蒔雜糧捕魚牧養為生。樹多椰實。有雞、羊豕，無他畜。形狀無異臺番，性最馴良，牧羊於山，剪耳為誌，無爭奪詐虞之習。民人貿易至其地者攜火槍，知其能傷人也，輒望望然去之。語音有與大西洋相似者，實莫測其所由。地勢周圍六十餘里，山有高至五、六十丈者。社居凡七，散列四隅，男女大小不及千。光緒三年，前恆春縣周有基率船政藝生遊學詩、汪喬年履其地，歸述其所見如此。

又有火燒嶼者，橫直二十餘里，與紅頭嶼並峙，水程距卑南六十里，有居民五百餘。商船避風，間有至其地者。²³

本則筆墨形容在文末說明為「游學詩、汪喬年履其地者，歸述其所見。」如此正可以確認「案頭山水」寫作之存在。若是者，或可求諸陸機〈文賦〉中有一句眾所周知的名言：「課虛無以責有，叩寂寞而求音」，²⁴文人創作總難免藉由浮想聯翩而馳騁墨瀋，然則依憑妙筆生花的筆觸，課虛責有、叩寂得音，加上過人的想像力，也就讓作家能身處魏闕之下而思通千里之外，寫出彷彿「身歷其境」的佳構了。類似的引例，將於下節中再觸及。

此外，相較於鄺道元、楊炫之，連橫對於身親歷之似乎懷抱著更強烈的堅持。他極力主張「欲為臺灣之詩，須發揮臺灣之特色。」²⁵書寫題材就在詩人走動的環境之中，臺灣的山水之美橫陳眼前，「臺灣景色皆詩料……」、「臺北詩境……」、「滿山皆詩料也」。他抨擊擊鉢詩，明明是身在臺灣蝸居之中，徵詩者竟舍近而圖遠，仿作「桃葉渡」、「莫愁湖」、「咸陽弔古」一類，題目雖佳，終乏觀感，純然為詩造情，「雖極能事，終是死詩，而非活詩。」²⁶「如以江南花月、塞北風雲而寫臺灣景象，美則美矣，猶未善也。」²⁷在創作論裡他提及虛心靜氣的修養方法，走入一己處身的自然：

圓山也，碧潭也，北投也，皆臺北附近之詩境也。遠而淡水之濱，觀音之麓，社寮之島，屈尺之溪，亦足供一日之遊。杖頭囊底，妙句天然。我輩仄居城市，塵氛撲人，何不且捐俗念，一證真如？²⁸

²³ 連橫：《雅堂文集》（南投：臺灣省文獻委員會，1992），頁 218-219。

²⁴ 陸機：〈文賦〉，收錄於閔福德、劉紹銘主編：《含英咀華》（上卷：遠古時代至唐代）（香港：中文大學，2001），頁 250。

²⁵ 連橫：《雅堂文集》（南投：臺灣省文獻委員會，1992），頁 270。

²⁶ 同前註，頁 281-282。

²⁷ 同前註，頁 270。

²⁸ 同前註，頁 272-273。

上文裡，連橫一語雙關，意謂吾人此身所在之現場方為自我安頓之地，而惟有自我安頓後，得以安頓詩之思，一體真如。他以為，詩人欲進入創作之心靈有賴於「現場」，詩作題材暨其命題，所應秉持的原則完全相同。詩歌膚淺的表層之美，卻失去最重要的生命力。這正是連橫對新文人所批判的——舊文人作詩惟務懷古傷情，暮氣沉沉——的一個非常重要的自我反省。²⁹

連橫既如此強調作者的在場經驗，他自己卻也寫作案頭山水，如何解釋？我們或可以說，這是無法親歷其境，不得不退而求其次的補救辦法。如此一來，就案頭山水而言，中國與臺灣有何不同？是皆訴諸想像的「課虛無以求有」耳。那麼，連橫對於臺灣書寫的堅持是否就失去了立足點？此亦不然。儘管是訴諸想像，其站在理解臺灣的基礎上想像臺灣，並未失去「女為臺灣人，不可不知臺灣事」³⁰的立場。

然而，即便連橫大聲疾呼臺灣之名勝古蹟，實可用來做為詩歌的好題目，言者諄諄，聽者藐藐，卻始終無法提起臺灣詩人書寫的興趣，以至於連橫有如此之扼腕：

婆娑之洋、美麗之島，昔人所謂海上仙山者也。故自開闢以來，中土士夫之戾止者，多有題詠。……今之作者何不著意於此，而乃作此毫無關係之題目！臺灣詩人雖多，而真能為臺灣作詩者，有幾人哉！

臺灣屹立海上，山川多秀，氣候如春。眼底風光，足供吟料，而臺人士未知收拾，寧不可惜！³¹

對於這個現象，過去包括筆者在內的研究者，都認為課題擊鉢仿古製題，內容千篇一律寫塞外、江南等中原地景，係詩人懶於創新或習於抄襲之故。然而，在閱讀連橫這兩志之後，卻有了非常不同的體會。這就如同陳夢林修纂《諸羅縣志》，「未循古制，每每忐忑不安。」³²未被人文化的山水，邊緣的殊方必須成為中心的此方的連類譬喻，以完成地方的經典化，連橫隱隱然體會到這種必要性，以及面對此一必要性所需採取的途徑，便是透過史跡、古蹟的書寫，詩人佳篇的舉隅。這樣的做法，或許傳承向來有著自己的符號系統或者演示方式，被「刻寫」在紀念碑、博物館等有形載體上文的字、圖片和儀式等；它也通過無形的渠道代代相傳，去形塑共同體分享的記憶。《水經注》、《伽藍記》滋養了唐代李白、杜甫

²⁹ 有關連橫為詩主張應以臺灣實境與經驗為書寫對象的論述，詳江賓叙：〈向文化大傳統的回歸與變奏——連橫對臺灣古典詩「正典」的追尋〉，《東吳中文系學報》22期（2011.11），頁249-280。

³⁰ 連橫：《臺灣通史》（南投：臺灣省文獻委員會，1992），頁990。

³¹ 連橫：《雅言》（南投：臺灣省文獻委員會，1992），頁177。

³² 陳夢林：〈自序〉，《諸羅縣志》（南投：臺灣省文獻委員會，1992），頁4-5。

等詩人的創作，甚至我們也可以看到柳宗元的〈永州八記〉取法《水經注》的蛛絲馬跡。蘇軾〈寄周安孺茶〉詩亦提及：「嗟我樂何深，水經亦屢讀。」³³則兩書的問世，實為當代以及後世詩人創造了大好的詩歌材料。而連橫二志這些文言漢文中的鄉土敘事在一、二〇年代的刊載，為當代所接受儘管有限，卻在臺灣二、三〇年代鄉土文學、臺灣話文的論戰中，一方面為連橫打開言說的空間，另一方面又加強連橫對於其重要性的認知，後人集結梓行後成為地方無可取代的無形文化資產。

而爬梳〈史跡志〉和〈古蹟志〉，可以發現兩種判然可分的書寫方式。〈史跡志〉涵攝整個臺、澎領域，幅員較廣之外，一如上述，連橫描述地景遺跡時，以診視山水之方式書寫者，較多。〈古蹟志〉則因為為連橫家鄉，幾皆為身親歷之。兩志在「地方記憶和認同」之表現的方式以及不同程度，筆者將分別做進一步的梳理。

三、〈臺灣史跡志〉的地景敘事與視角

檢視連橫〈史跡志〉的若干寫作技巧，諸如援引前修之作、紀錄騷人歌詠，等等，其撰述模式，均可追溯至酈《注》。或者我們可以這樣說，酈道元《水經注》的地景表述方式，已成為後世文人借鏡取法的楷式，因此連橫撰寫史跡景點時，時有因循酈氏書寫方式的軌跡。如連橫描繪〈火燄山〉一文云：

火燄山在臺中之東，貓羅、貓霧兩山為之左右，危峰突兀，秀插雲霄，狀若火燄。樹林密茂，上多松柏，下為烏溪之流。山半有蝙蝠洞，多而且大。山上有池周數丈，雖大旱不涸。相傳池中有文龜，風雨將至，則見於水面。曙色初開，霞光燦爛，《府志》所謂「燄峯朝霞」，為彰化舊八景之一；而《諸羅志》所謂九十九峰者，則指此也。³⁴

以上，「危峰突兀，秀插雲霄」云云，在酈氏山水描景的形容中，類似譬喻，隨處可見，諸如「長城之際，連山刺天」（《水經注·卷三·河水》）、「夾岸深高，壁立直上，輕崖秀舉，百有丈餘」（《水經注·卷四·河水》）、「虎牙桀立，孤峰特拔以刺天」（《水經注·卷八·濟水》）、「四面壁絕，極能靈舉，遠望亭亭，狀若單楹插霄矣」（《水經注·卷三十一·

³³ 蘇軾著，馮應榴輯註，黃任軻、朱懷春校點：《蘇軾詩集合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頁2403。

³⁴ 連橫：《雅堂文集》（南投：臺灣省文獻委員會，1992），頁216-217。

湓水》），由此可知連橫山水刻繪和鄺道元之間的可能聯繫。

惟連橫自負才情，並非亦步亦趨的一般文人，故其地景書寫，仍有其特色在內，此部分將於後文提及。

由於〈臺灣史跡志〉是概略介紹臺灣全島與離島的地理樣貌及歷史事蹟，但全臺的範圍較大，使得連橫無法一一親身前往踏查，特別是前引幾則的地方皆位於台灣東部，一○年代，交通殊為不便，筆者檢尋連橫所有創作之餘，並參考已撰製的年表重製一年表，未見到連橫的東遊記錄，可見其有關東臺的描寫都屬案頭之作，不是依靠史籍記載，便透過前人詩詞來領略當地之美；也就是說，以他人的介紹來作為本文的內容。諸如該篇「阿猴林」條：

阿猴林則今屏東，番語也；或作阿猴，或作阿猴。臺灣外紀曰：林道乾據打鼓山，餘番走阿猴林。臺灣雜記曰：鴉猴林，在南路草日（按：當作「目」）社外，與傀儡番相接，深林茂竹，行數日，不見日色，路徑錯雜。傀儡常伏於此，截取人頭以去。此書為康熙二十四年諸羅令季麒光所著，閱今二百四十餘載，已為富庶之區。即阿猴以南之番地，亦悉成都成聚，適彼樂郊矣。光緒紀元，開山議起，設下淡水縣丞於此，今為郡。³⁵

以上，連橫援引史籍《臺灣外紀》、《臺灣雜記》的相關載錄，作為引介「阿猴林」的基礎，因此，連橫觀看的視角就不是以自身經驗出發，而是透過他人之眼來看，這樣停留在「空間」的層次，也就是以站在外圍角度去觀看此地。另外，就表述內容來說，上引文字呈現出「知性」文字的考索，這種客觀筆觸，雖則塑造其專業形象，但同時也減卻了在地經驗的情感氛圍，然而遊歷經驗所銘刻的主觀記憶，正是賦予空間／地景書寫一種動人的要素。段義孚是如下界定「經驗」的：

「經驗」乃跨越人之所以認知真實世界及建構真實世界的全部過程。……經驗是「感覺」和「思想」的綜合體。³⁶

以是，文人如有親臨地景的真實「經驗」，則可透過感覺（感官上的視覺、聽覺、嗅覺、觸覺等）與「思想」（「決定環境的空間組織的原則和幾何性設計」³⁷）的組構，將體驗形

³⁵ 同前註，頁 205。

³⁶ 段義孚（Yi-Fu Tuan）著，潘柱成譯：《經驗透視中的空間和地方》（臺北：國立編譯館，1988），頁 7-8。

³⁷ 此語係段氏該書的描述，出處同上註，頁 14。

諸筆墨，倘是「『感覺』和『思想』的綜合體」，也將令筆下的形容效果，增色不少。

不過，理當指出的是，臺灣幅員畢竟不能和鄺《注》所涉及的遼闊疆域相比，而連橫在臺也確曾遊歷府城以外的若干景點，乃至移居臺中³⁸、臺北³⁹等處，故〈臺灣史跡志〉的紀錄中，會有數處描述自身「經驗」的記憶書寫，如「西雲巖」條：

西雲巖在淡水觀音山麓，一作栖雲寺；見林鶴山琴餘草。復建凌雲寺於山上，乃稱凌雲為內巖，栖雲為外巖。巖則寺也。石古林深，境絕幽邃，余曾遊之，有詩載集中。⁴⁰

引文中，連橫所謂「有詩載集中」云云，現收入《劍花室詩集》，所作者係題名〈宿栖雲巖〉的組詩：

昨從雲中來，今向雲中去。來去本無心，白雲在何處。
夜宿山上寺，晚汲山下泉。紅埃飛不到，一夢亦翛然。
萬木嘯寒蟬，殘花啼一鳥。天籟自然鳴，令我詩魂悄。
寂寂貪枯坐，玄玄悟色空。無人無我相，萬劫一塵中。⁴¹

連橫性本近佛，他曾於1924年開設「六波羅蜜」、「釋迦佛傳」等講座⁴²，後並發表多篇考證佛學的文章⁴³，另據鄭喜夫《連雅堂先生年譜》所載，民國七年（1918）臺中開靈山大會，曾邀請內陸法師釋太虛蒞臺共襄盛舉，而連橫和太虛多所唱和⁴⁴，故可知連橫對於佛學的親近態度。也因為如此，上面所引的詩句裡，頗能呈現參禪的妙境，詩中「無人無我相」云云，典出《金剛經》所謂「無我相、無人相、無眾生相、無壽者相」之語，

³⁸ 鄭喜夫《連雅堂先生年譜》：「清德宗光緒三十四年戊申（一九〇八）……春，先生移家臺中，入臺灣新聞社漢文部。」（南投：臺灣省文獻委員會，1992），頁48。

³⁹ 鄭喜夫《連雅堂先生年譜》：「中華民國八年……春，先生應華南銀行發起人林熊徵聘，為處理與南洋華僑股東往還文牘之秘書，移家臺北大稻埕。」（頁90-91）

⁴⁰ 連橫：《雅堂文集》，頁222。

⁴¹ 連橫：《劍花室詩集》（臺北：臺灣銀行發行、中華書局經售，1960），頁67。按：臺灣省文獻委員會編印《劍花室詩集》將本組詩合併為一首，然觀看上下詩句，宜析為四。

⁴² 鄭喜夫《連雅堂先生年譜》：「（一九二四）一月……十七日……是夜，先生在臺灣文化協會臺北支部第七回通俗學術土曜講座講『六波羅蜜』。」（頁105）；又：「（一九二四）四月……十九日夜，先生在臺灣文化協會臺北支部第二十一回通俗學術土曜講座講『釋迦佛傳』。」（頁112）

⁴³ 如1930年發表系列〈觀世音考證〉專文，載於《臺灣民報》第294號（參鄭喜夫《連雅堂先生年譜》，頁153-154）。

⁴⁴ 詳參鄭喜夫：《連雅堂先生年譜》，頁90。

佛教要信眾滌蕩人、我分別相，也就是「無分別心」，勘破執著念，連橫自詡在佛寺「栖雲巖」中，已然體悟教理真言，故化入詩句，作為詮解。所以，總結該組詩內容併參〈臺灣史跡志〉的描述，栖雲巖在連橫記憶中的「地區意識」，占有特殊位置。邁克·克朗(Mike Crang)在《文化地理學》(Cultural Geographies)談論「空間經驗」時說道：「在一個地方居住一定時間就會導致與當地人長期形成的特徵相融合」⁴⁵，克朗於文後補充了相關的哲理基礎，亦即胡塞爾「現象學」中所謂「意向」的概念：

胡塞爾提出了本體論學說，一個關於什麼是存在的理論。他認為雖然世界可以被觀察的，但是對於物體或觀察的對象而言，還有更多的東西，之所以會這樣，他認為是由於「意向」所造成的。比如說，一只足球……只有在有人開始踢它或將它用於比賽時，它才成為一只足球。一個物體只有把它與人們賦予它的用途聯繫起來才成為某個東西。因此，按照本體論的思維，我們稱之為足球的現象不僅存在於物體本身，也存在於我們對待它的方式中。……這種思想為地理學提供了新的可供研究的領域。地區不再是一些收集的資料數據，它包括了人的意向。我們不應只是數一數主要街道上商店的數量，而且應了解這條街道對它的使用者的意義。⁴⁶

以上，由於連橫參訪「栖雲巖」，在「使用者的意義」上，該處屬於超脫紅塵的智慧場域，故連橫在借宿中也讓自我的身心契入代表佛教莊嚴聖地的寺廟裡，從而書寫的詩文，便沾染佛學的真諦，不論詩句的禪境，抑或文章所謂「石古林深，境絕幽邃」等語，都將佛寺背後所代表的地方特徵和意涵，融入作品當中。

另外，連橫也談論其「知交」的景點，比如「鰲峰」條：

鰲峰則牛罵頭，或作寓鰲頭，番語也。清初仁和郁永河曾至其地，《稗⁴⁷海紀遊》載之。自是以來，我族移處，遂成都聚，而蔡氏實為望族。敏川先生與弟敏南素友愛，老而彌篤。晚年同居一樓，曰伯仲居，又曰川南別墅，命名甚善。唐棣荊花，誠足媲美。南丈之子惠如，負幹才，有遠志，與余交莫逆，故余數至其家。今二丈雖沒，而典型尚在，思之撫然！山麓有泉，甘而冽，聞為土番

⁴⁵ 邁克·克朗(Mike Crang)原著，楊淑華、宋慧敏譯：《文化地理學》(南京：南京大學出版社，2005)，頁106。

⁴⁶ 同前註，頁100。

⁴⁷ 按：此處「稗」，當作「裨」，後文援引將附加校訂文字。

所鑿，莊人皆就飲焉。或曰：荷蘭之時，曾設牛頭司於此，故稱牛馬頭云。⁴⁸

從上面引文暨前揭援引「阿猴林」的內容可知，連橫在書寫臺灣各地方的區域，是概略介紹原始地名及其命名由來，後續則援用重要的前人著述以作為權威紀錄，如本則「鰲峰」是參考《稗〔裨〕海紀遊》來寫這一簡介，換言之，連橫也仍透過他人之眼來當作立論的基礎。不過，本則引文和「阿猴林」有所不同的是，連橫在引介景點的過程中，順勢帶出了該地的重要人物軼事。郁永河為大家所熟知，不贅。敏川為蔡敏川，1909年2月11日紀元節，臺中廳長佐藤謙於知事舊館招宴並唱和。席中有蔡蓮舫。佐藤謙率先賦詩，後刊於《臺灣日日新報》，諸人唱和之作亦連載於報。⁴⁹惠如為蔡惠如，係連橫於臺中活動時時相過從的友人，1911年曾共事處理蔡啟運的喪事，⁵⁰同年曾一起參加櫟社文人發起的「中央金曜會」。⁵¹《臺灣詩薈》發刊時，蔡惠如填詞祝賀⁵²；治警事件後蔡惠如出獄，連橫亦撰詩祝賀。⁵³這樣，也就讓純粹的知性記載因為點染了人與人、人與事件、人與文學交流的感受而增益人文情懷，再者，本則內容中，連橫還提及「鰲峰」川南別墅的後人與其莫逆相交的說明，「余數至其家」云云，更表明了連橫有著親臨其地的空間體驗，因而，該條目對山泉甘冽的描述，就不能只被視為挪用他人的形容。

讓我們再看連橫對「鐵砧山」的描述：

鐵砧山在大甲溪北。永曆二十四年，斗尾龍岸番亂，延平郡王經自將討之，毀其社，遂登鐵砧山，留百人屯田，以制蓬山諸番。山下有井，曰國姓井。淡水廳志謂鄭氏屯兵大甲，水多瘴毒，乃拔劍斫地得泉，味清冽。井旁有碑，為光緒乙酉余望、林鏘等所立，誤為成功駐兵之事。且言清明前有群鷹自鳳山來，聚哭不至疲憊不止；或云兵魂固結所成。山麓田螺斷尾能活，謂當時螺殼棄置

⁴⁸ 連橫：《雅堂文集》（南投：臺灣省文獻委員會，1992），頁220。

⁴⁹ 席上另有王學潛、山田孝、林幼春、陳百川、吳鶯旂、林耀亭、呂鶴巢、傅錫祺、鷹取岳陽、呂汝玉、蔡敏川、蔡敏南、林紀堂、蔡啟華、林獻堂、文斯霞、林燕卿等人。參：竹亭佐藤謙，〈明治己酉紀元節日設雅筵於知事舊館恭賦長句一篇聊以引諸士高吟云爾〉，《臺灣日日新報》，1909.02.19，01版。

⁵⁰ 蔡啟運逝世。林癡仙、傅鶴亭、黃旭東、鄭汝南、蔡惠如、林望洋、連劍花等集議公弔之事。命劍花撰誄。而舉癡仙鶴亭前赴苑裡弔奠。〈臺中通信（廿八日發）死生契闊〉，《漢文臺灣日日新報》，1911.05.01，03版。

⁵¹ 瑞軒梅花逢盛開，雅堂乃任東道，函招會有觀梅，與會有傅錫琪、鄭嘯陵、黃旭東、蔡惠如、林子瑾、林望洋等。〈臺中通信（十五日發）雅人深致〉，《漢文臺灣日日新報》，1911.01.17，03版。

⁵² 鐵生，〈滿庭芳雅堂發刊詩薈來書索詞填此以祝時適舊曆元旦也〉，《台灣詩薈》第2號（1924.03.15），頁23。

⁵³ 連雅棠，〈聞南強鐵生芳園出獄走筆訊之〉、〈鐵生出獄以螭龍吟寄余走筆報之〉，《台灣詩薈》第19號（1925.07.15），頁4、6。

者均著靈異。同治二年，林日成攻大甲不勝，登鐵砧山，禱於延平郡王祠，弗吉而還。苗栗陳滄玉有鐵砧山弔古云：「憑弔空山感百端，延平創業最艱難。孤軍地拓田橫島，上將身登韓信壇。井水一泓冰雪冷，劍光萬丈斗牛寒。鐵砧舊蹟堪千古，想見英雄立馬看。」其弟聯玉同作云：「地下英雄骨已寒，尚留遺蹟隱雲端。卅年孤島延明祚，一代頭銜署漢官。左衽肯為降虜計，焚衣合作棄襦看。荒山俎豆今安在，井涸碑橫夕照殘。」滄玉名瑚，號枕山，聯玉名貫，號豁軒，均能詩。⁵⁴

上引文字，很明顯紀錄了騷人墨客對「鐵砧山」的感喟，從而也讓原本知性的史跡添增感性的抒情，復加上歷史記憶的追懷。從表面上看，連橫只是挪用了陳氏昆仲的詩文以作為詮釋「鐵砧山」地景的見證。但陳瑚、陳貫兄弟，實際上也是連橫的至交，連橫在臺中居住期間，與「櫟社」詩友往來甚密，陳氏昆仲正屬「櫟社」社員，故連橫援引陳瑚、陳貫的詩句，就帶有前述所謂「人的意向」和「使用者的意義」在內。要之，連橫此舉，一方面保存了友人的作品於其文獻之中，帶有推薦、褒舉的意味（故連橫方說「均能詩」）；另一方面，陳氏昆仲之詩，符合連橫「崇明抑清」的民族大義心理（詳下節探討）——陳瑚所謂「孤軍地拓田橫島」，以田橫義不降劉漢，隱喻鄭氏父子抗清的氣節；而陳貫所謂「卅年孤島延明祚，一代頭銜署漢官」，更挑明「驅逐韃虜」的志向，雖則鄭氏王朝國祚不永，但其風其義，自是長留人間。因此，連橫援用陳氏昆仲的詩句，也在無形中，表述了自身的國族立場，從而亦讓連橫的地景書寫，突出了不同於酈道元《水經注》地景描述的成分。

末後，我們可從〈臺灣史跡志〉檢視地景書寫的分布比例，〈臺灣史跡志〉提到地名與地景如下：

地名	地景
臺北	國姓埔、劍潭、鸚哥石、西雲巖、反經石、北投、艋舺、大龍峒
桃園	蓮座寺
新竹	氏祖墳、紅毛港
臺中	霧峰、鐵砧山、翁仔社、葫蘆墩、大里杙、平臺莊、草鞋墩、土城莊、迴馬社、火燄山、阿罩霧、鰲峰、林剛愍墓、王田莊、藍興堡、十八義民之墓
南投	林圯埔、制火潭、小半天、日月潭、林參軍墓、甘泉井
雲林	北港、斗六門
彰化	定軍亭、鄧國公墓、蔣國公墓、鹿港

⁵⁴ 連橫：《雅堂文集》（南投：臺灣省文獻委員會，1992），頁 209-210。

地名	地景
嘉義	嘉義故縣、顏思齊墓、紅毛井、將軍莊
臺南	承天故府、半月城、大東門、春牛埔、鯽潭、安平、林鳳營、查畝營、官佃莊、果毅後莊、曾文溪、鐵線橋、漚洪莊、舊社、龍湖巖、黃蘗寺、竹溪寺、萬壽寺、馬公廟、文廟、陳總制墓、李孝廉墓、石虎墓、鹿耳門、七鯤身、開山王廟、火山
高雄	萬年故縣、半屏山、蓮花潭、竹滬、旗後、曹公圳、阿猴林、阿公店、羅漢門、鳳山、龜山、超峰寺、打鼓山、前何莊、岡山
屏東	柴城
宜蘭	羅東、甲子蘭
花蓮	花蓮港、璞石閣、繡孤鸞
臺東	紅頭嶼
澎湖	雞籠嶼、盧司馬墓、將軍澳、菩薩寮

以上，從〈臺灣史跡志〉中所描寫的地景與地名數量，以臺南最多，有 27 項；臺中次之為 16 項；高雄為第三，有 15 項，台北居四，8 項。這又與臺灣開發史相符，臺南本為渡臺漢人最早開發之地，經營數百年，所顯現的地名當然也就最多，再加上臺南為連橫故里，高雄自明鄭時期就開發，離臺南最近，向外開墾必以高雄為先。至於臺中與臺北更是從南到北開墾過程的重要大城，因此在臺灣史跡上便有不少的地名與地景。

總上所言，〈臺灣史跡志〉所描述府城以外的地名，除了連橫遷居過的臺中、臺北之外，以東臺為主的其他地區多半是連橫站在外界觀看的角度所書寫的，連氏參考典籍或他人文集所載以書寫一篇地名指引和介紹，並非親自處身於現場。也就因此並無在地生活經驗，較未能顯現出他對地方的認同感。末後，本文再以「雞籠嶼」為例：

侯官楊云滄孝廉新修《淡水廳志》，其言多謬，同安林卓人已彈之矣。余摘其誤，莫如地理。雞籠嶼為澎湖群島之一，鄭氏守之，清軍攻之，見於靖海奏疏，而雲滄以為淡水之雞籠。夫靖海未得澎湖，何以別攻臺北？且澎湖一破，克塽遽降，又何必再攻臺北？此固必無之事也。鳳山令譚垣〈巡社〉詩有上下淡水二首，此為下淡水溪畔之番社，而雲滄獨取上淡水一詩列入文徵，是誤為臺北之淡水矣。譚垣為鳳山令，非淡水同知，何以巡社及此？此又事之所必無者也。夫作史不明地理則不能論其險夷；讀史不辨地理則不能知其興替。雲滄聰明人，

雅負時望，乃於此事漠不關心，宜乎卓人攻其隙漏，多至數十條也。⁵⁵

按理，空間的命名與指涉，泰半因襲前人或承襲舊有的典籍，而此處連橫在寫地名介紹時特別進行勘誤的工作，可以看到連橫學問家的立場與考古癖。我們也發現，臺灣的地方往往隨著統治者的變遷而有不同的命名，如清領、日治、國民黨政府時期等階段，臺北市街巷的名調就存在著鉅大的差異。一般而言，統治者在劃分地名界線與地名內容時所做的命名與賦予實質內涵，雖然於理有據，但並沒有以在地經驗出發來作情感上的描述，究其實質，總是與住民以空間記憶作為命名的方式，大不相同，少一份認同，如民間稱基隆為雞籠。而這種考據癖，即便是以個人親歷經驗為敘事材料的《伽藍記》，亦頗有類似。如《伽藍記》卷二載：「明懸尼寺，彭城武宣王勰所立也」，下文楊氏自註曰：

銜之按劉澄之《山川古今記》、戴延之《西征記》並云：「晉太康元年造。」此則失之遠矣。按澄之等並生在江表，未游中土，假因征役，暫來經過；至於舊事，多非親覽，聞諸道路，便為穿鑿，誤我後學，日月已甚。⁵⁶

以上，楊銜之喝指摘劉澄之、戴延之穿鑿附會的不實紀錄，這種「求是」的史家態度，我們還可以在連橫〈史跡志〉見及，諸如「劍潭」條：

劍潭在臺北城外，水清而秀。相傳荷人插劍於潭邊之大樹，故名。或曰：延平郡王投劍於此，風雨晦明，尚騰奇氣，故有「劍潭夜光」之景。二說均屬荒談。荷人插劍，得之傳聞，延平亦未至臺北，故知其出於附會也。⁵⁷

此外，「小半天」條，所謂「而平定臺灣述略謂……非實也」；⁵⁸「開山宮」條，所謂「今且以開山為開仙，抑又誤矣」；⁵⁹並同前揭引文「雞籠嶼」條所謂「侯官楊雲滄孝廉新修淡水廳志，其言多謬」等語，皆可以清楚看到連橫個人地方記憶闕如，而訴諸歷史知識的面向。這亦可以視為〈史跡志〉的特色之一。

⁵⁵ 連橫：《雅堂文集》（南投：臺灣省文獻委員會，1992），頁214。

⁵⁶ [北魏]楊銜之著，楊勇校箋：《洛陽伽藍記校箋》（北京市：中華書局，2006），頁70。

⁵⁷ 連橫：《雅堂文集》（南投：臺灣省文獻委員會，1992），頁212-213。

⁵⁸ 同前註，頁212-213。

⁵⁹ 同前註，頁245。

四、〈臺南古蹟志〉對地方記憶的想像與建構

若說〈史跡志〉是文獻史料上整體「面」的概略介紹，具有補正史之闕和「以為讀書稽古之助」⁶⁰的功能性意義，那麼〈古蹟志〉則是就具特殊意義的「點」來作深入踏查，對闡述地方文化的底蘊，更具歷史特色。〈古蹟志〉所提到的史跡均為人文設施或人文景觀，而非人自然生活的空間。也因為是人文設施或人文景觀，所以「人」的故事既佔居非常重要的成分，也煥發出特殊的意義。這些人的事蹟從明清流傳下來，所呈現的底蘊，是一座城市的記憶與呼吸，事實上也可以視為該地「場所精神」(genius loci)⁶¹的表徵。雖然，就一般人而言，府城的人文設施或人文景觀，只是破敗不堪的老建築，抑或現代景致中蕭條的陳跡，但對在地人來說，它們卻包涵了無可取代之生活留痕的文化景觀。這些古蹟的存在，與住民的日常活動交錯，織造出非凡的內容，蘊含著地方的視覺性，由這視覺性而傳達了歷史的時間感，引發出人的地方感與存在感。

復次，作為府城的臺南，古蹟是認識府城最好的切入點。對這一點，從連橫不斷引用「臺南固舊時都會，仕宦遨遊，商賈雲集」，⁶²他的詩集命名為「寧南」，一再提及鄭成功在台南的文教創制，而有文運日啟的傳承意味，都可以看到他對臺南此一文化古都的覺識(awareness)。透過古蹟地景的觀看，人們重返過去的記憶，感受城市昔日的時代氛圍，更何況，較諸〈史跡志〉所述的臺中、臺北，臺南緊緊牽繫著生命記憶：連橫童年成長穿梭的履跡，他與家人共同生活的悲歡，與南社師友的交遊，在《臺南新報》、《三六九小報》等職涯的展開……。段義孚詮釋「地方之愛」(Topophilia)時指出，人們藉著自我的感知、經驗與想像……，去體驗、認識周遭世界，並以之為基礎，對自己居住的所在，產生情感聯繫，或發展出一種依附／眷戀感⁶³。連橫不只驕傲地吟詠：「文物臺南是我鄉」⁶⁴，在各種著作之上自署台南連橫，以台南為自身的惟一故里，更透過文獻蒐羅，描繪臺南風俗之純古，透過婦女婦女出門，必攜紙蓋障面，為含蕊傘，將之譬擬為宋光宗紹熙元年(1190)

⁶⁰ 同前註，頁189。

⁶¹ 所謂「場所精神」(genius loci)，正如諾伯舒茲(Christian Norberg-Schulz, 1926~2000)所詮釋的那樣：「『場所精神』(genius loci)是羅馬的想法。根據古羅馬人的信仰，每一種『獨立的』本體都有自己的靈魂(genius)，守護神靈(guardian spirit)這種靈魂賦予人和場所生命，自生至死伴隨人和場所，同時決定了他們的特性和本質。」(氏著《場所精神——邁向建築現象學》，施植明譯，臺北：田園城市文化公司，1995，頁18)。

⁶² 連橫：〈花叢迴顧錄(一)〉，《臺灣詩薈》下冊(南投：臺灣省文獻委員會，1992)，頁396。

⁶³ 《地方之愛：環境感知、態度與價值的研究》(Topophilia: A Study of Environmental Perceptions, Attitudes, and Values) Topophilia是複合名詞，由topo(place)和philia(love)兩個字組成

⁶⁴ 連橫：《劍花室詩集》(臺北：臺灣銀行發行、中華書局經售，1960)，頁77。

四月朱熹曾經治理的漳州，讚譽其地「多沿紫陽（朱熹 1130-1200）治漳之法」。⁶⁵

於是，連橫藉著考察古蹟，是將他自身或與前人所記憶中的地方重整且建構為實質的象徵，儘管經過百年以上的變遷，有些古蹟已經毀壞或者改作它途，透過考察的觀照，去完成一種標定，凸顯在這城市的存在與意義，轉化成地方的記憶。換言之，走訪與考察是從記憶中的地方轉化成地方中的記憶，從而變成府城人共有的地理景觀與歷史認知。例如〈臺南古蹟志〉「禾寮港」條：

禾寮港即今打銀街，鄭氏之時尚有港道，今變通衢。而西城以外之佛頭港、關帝港、媽祖港、王宮港、番薯港，皆舊時運河，現已淤塞。⁶⁶

明鄭時期的「禾寮港」，並其周遭諸港道（佛頭港、關帝港、媽祖港、王宮港、番薯港等等），原本屬於水上生活的地方景觀，惟在百年之後迭經變遷，滄海桑田、物換星移，到了日治時期，因為港道淤塞，於是轉型成以製作金銀飾物為主的「打銀街」，這其中的記憶變遷，是府城人共有的精神遺產，也是府城人引以為念的歷史認知。

再者，若以「空間」來論斷，空間只是一種「命名」，無論是承天府、臺灣府還是臺南州，這不過是一個由外來者或統治者以此名之的座標，缺乏生活事實，但是若作為「地方」，是要有實質的生活經驗於內，如此方才具備人文情感的在地記憶。其中，地景是最好的定位座標，地景又分為地形地勢（可以觀看的事物）與視野觀念（觀看的方式）。地形、地勢就是古蹟，是連橫可親臨探訪，甚至親手觸摸的實質景物，事實上，連橫也藉由進入古蹟或勘察遺址，來進入歷史的氛圍中。諸如〈臺南古蹟志〉「五妃墓」條：

五妃墓在寧南門外桂子山，寧靖王從死嬪妾也，曰袁氏、王氏、荷姑、梅姑、秀姐。臺人士感其義，就墓就廟，歲以六月二十有五日致祭。鄭氏奉表降清，而明朔滅亡之日也。廟前有古榕一株，蔭大可數畝，踏青士女每止其中。追懷節烈，是則人倫之坊表、巾幗之綱常，誠足以頑夫廉而懦夫立也。⁶⁷

上文中連橫以為，「五妃墓」背後可歌可泣的史實，不知名的人們感其義，遂自發性地就墓就廟定時致祭，已是一種地方之愛之實例的彰顯，而它的效應又不止於此，更進一步的，令駐足賞玩的遊客產生「頑夫廉而懦夫立」的淬勉心理，這樣的說法，除了呼應前

⁶⁵ 連橫並引張鷟詩形容其景象，云：「一隊新妝相掩映，紅葉葉底避斜暉。」連橫：《雅堂文集》（南投：臺灣省文獻委員會，1992），頁184。

⁶⁶ 連橫：《雅堂文集》（南投：臺灣省文獻委員會，1992），頁245。

⁶⁷ 同前註，頁244。

文援引胡塞爾「現象學」概念中「人的意向」和「使用者的意義」的自我覺察和省思的觀念，也呈露了連橫對於「明朔滅亡」的感喟心理，從而其祖國認同的意識也可輕易推得。短短的幾行字含蘊層層轉折，事實上為〈史跡志〉中所少見。

此外，觀看的方式也是一個很重要的地方感。連橫的〈臺南古蹟志〉書寫該地區人文設施或人文景觀的歷史沿革，在時序上橫跨三代：明鄭、清代與日治，但事實上，如果我們仔細觀察，「古蹟志」所描繪的主體景致，率皆來自明清時期，改隸日治以後的「今昔對照」，應不只是用以凸顯「撫今思昔」的懷舊感傷而已，它可能隱含著楊炫之《伽藍記》中寄寓於北魏都城的禾黍之歎，尤有進之，它更有可能是一種被壓抑的現代性，亦即在殖民統治下，對殖民壓迫之抑而不言，不得不另尋言說策略的託喻，如「赤崁城」條文末所謂「唯使弔古者興無限之感歎而已」⁶⁸、「半月樓」條所謂「今樓已毀，池亦漸淤。寒葦荒畦，蕭然滿目，能不慨歎！」⁶⁹、「飛來峰」條所謂「今已式微。滄桑之感，能不慨然！」⁷⁰……等等，這些古蹟、地景的變遷係區分你我的重要分界，亦凝聚國族認同的象徵，它們的興建，並不是出於殖民政府之手，建築本身或亦不符合現代美學，過時而又破舊，無論從那一個角度來看，並無保存的價值。然而，身為在地的府城人，連橫的觀看卻飽含著記憶、情感與認同。易言之，連橫踏查古蹟的同持，也是尋找地方「本質」的過程，藉著跨入異時空的神遊向過去取得連結點，連結今日之府城於過去之歷史文化。總的來說，府城，對連橫而言，絕不只是一個「空間」而已，它是一個依附著無數真實生活之履跡的「地方」，它們本身就是一部府城發展史。

臺南固舊時都會，仕宦遨遊，商賈雲集。西關之外，盛設女閭，風定日斜，歌聲漸起，衣香花氣，蕩魄銷魂，誠昇平之樂事，而沉醉之柔鄉也。

海桑以來，日就衰落。閱今僅三十年，而南都金粉變為北地胭脂，迴顧花叢，閒愁萬種，真不勝今昔之感矣。⁷¹

進而言之，正如 Tim Cresswell 在《地方：記憶、想像與認同》一書中所說的：「地方不僅是世間事物，還是認識世界的一種方式……我們看見人與地方之間的情感依附和關連。我們看見意義和經驗的世界。」⁷²綜觀〈臺南古蹟志〉共紀錄了 44 處人文設施或人文景致，如下表簡單分類所示：

⁶⁸ 同前註，頁 239。

⁶⁹ 同前註，頁 250。

⁷⁰ 同前註，頁 252。

⁷¹ 連橫：〈花叢迴顧錄（一）〉，《台灣詩薈》下冊（南投：臺灣省文獻委員會，1992），頁 396。

⁷² Tim Cresswell 原著，徐苔玲、王志弘譯：《地方：記憶、想像與認同》（臺北：群學，2006），頁 21。

分類	古蹟名稱
井池	大井、荷蘭井、天池井、林投井
城樓	赤崁城、赤嵌樓、半月樓、奎樓
亭塔壇臺	一元子園亭、斐亭、四合亭、宜亭、一峰亭、秀峰塔、澄臺、聚星亭
機關	鄭氏故宮、承天舊署、東寧總制府
廟宇	小南天、開山宮、彌陀寺、鄭氏家廟、北園（北園別墅，後為開元寺）、夢蝶園（居所，後為法華寺）
堂館	萬卷堂、浮瓠草堂、宜秋山館、禊室、陳氏園（陳永華府）、南社（論文之所～近社學）、榕壇（海東書院內講學之所）
墓園	陳蔡二姬墓、兩公子墓、監國墓、五妃墓、閒散石虎之墓
港驛	國姓港、禾寮港
其他	烏鬼埕、桔柣門、馬兵營、檳林、飛來峰（吳園的假山）

若細究上表分類，至少可以發現到三個特質：

其一，典記人文遺蹟：連橫自己說道：

臺南為吾故里，惟桑與梓，必恭敬止。況釣遊之地，而不心焉繫之？顧自改隸沒，輒遭毀廢。今其存者，十不得一。爰志其略，以示後人。⁷³

記憶代表著一個人對過去活動、感受、經驗的印象累積，有相當多種分類，主要因環境、時間和知覺來分。外顯記憶指人能意識到的過往經歷，又被稱為陳述性記憶。內隱記憶則包括運動能力、行為習慣等等，吾人未意識到，但又確實是因過往經驗的影響而產生。記憶的深淺，則由該內容與其他內容之連接，或與情感對之的評價有關。⁷⁴這或可以解釋，作為故鄉的地方，與履跡所至的其他地方並不相同。唐韓愈〈送楊少尹序〉一文曾說：「今之歸，指其樹曰：『某樹，吾先人之所種也；某水某丘，吾童子時所釣遊也。』」⁷⁵其大旨在此。〈古蹟志〉裡，連橫先引用《詩經·小雅·小弁》：「維桑與梓，必恭敬止。」⁷⁶表達臺南為他的故鄉，童年生活的地方，書寫臺南，其懷抱與書寫其他地方有所不同是很自然的。進一步深入探究，他筆下的這些古蹟多半已經破敗毀棄，存留至日治時期的，幾近

⁷³ 連橫：《雅堂文集》（南投：臺灣省文獻委員會，1992），頁252。

⁷⁴ Alan Baddeley: *Essentials of Human Memory*. (Hove, England: Psychology Press, 1999)。

⁷⁵ 韓愈：〈送楊少尹序〉，收錄於葉百豐編著：《韓昌黎文彙評》（臺北：正中書局，1990），頁173。

⁷⁶ 程俊英譯註：《詩經譯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頁389。

於零。連橫因而撰述古蹟的起造以及古人活動其中的種種舊事，使之流傳後代，府城曾經的興築不至於在世變中毀於戰火或拆除時，又在文化記憶裡歸零，這便是連橫的「地方之愛」。另外，就另一角度來論，連橫此舉亦不無透過地方紀錄以喚起臺南住民之文化自覺的寓意。

其二：嘉揚明鄭正朔：連橫奉明鄭為正朔，可以辛亥革命推翻滿清之後，連氏所撰〈告延平郡王文〉為代表，文曰：

中華光復之年壬子春二月十二日，臺灣遺民連橫誠惶誠恐，頓首載拜，敢昭告於延平郡王之神曰：於戲！滿人猾夏，禹域淪亡，落日荒濤，哭望天末，而王獨保正朔於東都，以與滿人拮抗，傳二十有二年而始滅。滅之後二百二十有八年，而我中華民族乃逐滿人而建民國。此雖革命諸士斷脰流血，前仆後繼，克以告成，而我王在天之靈，潛輔默相，故能振天聲於大漠也！夫春秋之義，九世猶仇；楚國之殘，三戶可復。今者，虜酋去位，南北共和，天命維新，發皇蹈厲，維王有靈，其左右之！⁷⁷

從上面引文可明顯看出，連橫「崇明抑清」的民族大義心理，故而載諸〈臺南古蹟志〉中的相關描述，不論明鄭「機關」用地（鄭氏故宮、承天舊署、東寧總制府），墓園、廟宇、港驛等相關紀錄亦可看出連橫對「明鄭」政權的高度認同。諸如「國姓港」條：

國姓港在安平之北。延平入臺，泊舟於此。而臺灣以國姓名地者，尚有數處。山川草木，由我發揚，正朔衣冠，俾無隕落，故後人追溯其本，肇錫佳名，以傳千古，是亦崇德報功之意也。⁷⁸

所謂「山川草木，由我發揚；正朔衣冠，俾無隕落」，正是在聲明土地所有權或因客觀形勢而改易，但山川草木的內含、意義、價值，卻是我等主觀所能作為。務必在這上頭用心，則正朔方不致於隕落。關於正朔的爭奪，當時殖民政府以鄭成功母親為日本人，因而將明鄭視為日治歷史記憶的一部分，以至連橫有此一說以抵禦之。另外，「桔枋門」條亦云：

延平入臺後，因就赤嵌城以居，改名安平；安平即安海，志故土也。建桔枋門，以春秋鄭國有此門也。夫鄭雖小國，武、莊二君為王卿士。東遷以後，且與諸

⁷⁷ 連橫：《雅堂文集》（南投：臺灣省文獻委員會，1992），頁115。

⁷⁸ 同前註，頁242。

夏爭長，亦大國之風也。然門之遺址已不可考，唯見滿目寒蕪，灑一掬興亡之淚而已！⁷⁹

上面引文，一則強調延平郡王改名「安平」以示不忘「故土」的用意，再則說明建立「桔柣門」表明與滿清「爭長」的決心，隱吟禾黍之淚。

若我們要追問，何以連橫對延平郡王抱持著高度的認同心理，除了漢人意識的民族因素之外，曾迺碩《連橫傳》的說法，或許可提供另個解讀的面向：

明永曆十五年辛丑……鄭成功祭海興師，直向臺灣進兵……七月，鄭成功改臺灣街為安平鎮，十二月三日荷蘭首領揆一投降……是月，改臺灣為東都……立即實施兵農合一之屯墾制度。……安平鎮為荷人佔據時之駐在地，漢人開墾土地，亦稱王田。成功部下馬兵營官兵眷口，亦分配墾屯之田埔，中有一塊已廢菜園，稱馬兵營故園，後為雅堂先祖開居地也，是雅堂移民精神泉源乎！⁸⁰

曾氏將連橫故居遙接到鄭成功開墾安平時期，這樣的解讀策略，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說明連氏對鄭氏王朝的認同態度，也一定程度表徵了連橫的地方認同心理。

其三：保存生活記憶：對於曾經存在過的生活方式與記憶，透過敘事予以適當的保存，甚至遠稽古籍，恢復被湮埋的記憶。在〈過故居記〉一文中，連橫這樣寫著：

寧南門之內有馬兵營者，鄭氏駐節之地也。附城而居，境絕幽靜。自我始祖即處於是，及余已七世矣。宅十畝有奇，植竹為籬，南無之果十數章，皆大合抱，高或四、五十尺。夏時結實纍纍如絳珠，或碧如玉，味甘而冽，稱佳果。菩提、龍眼之樹稱是。皆我先大父所植者。宅外有道。夏秋間山水驟漲，自城隅來，當門而流；至八、九月始涸。鯉鯽之屬逐隊游泳，旦夕掬之以為樂。宅面西立，以人眾稍隘。余十二歲，我先君擴而大之，可居二十餘人。又買近旁吳氏園，為余兄弟讀書。吳園有宜秋山館，雪堂司馬所建，而謝琯樵曾寓其中者也。館外有亭，繞以欄，旁鑿塘，種荷其中。花時清香入戶，讀書其間，饒有悠遠之致。吾家固多花卉。抹麗盛時，每日可采一籃以餉親友。而余又愛花，庭隅路畔，幾無隙地。蘭蕙之屬以十數，晚香玉以百數。臺南天氣溫燠，每當十月之

⁷⁹ 同前註，頁 242。

⁸⁰ 曾迺碩：《連橫傳》（南投：臺灣省文獻委員會，1997），頁 1。

交，蘭、菊、桃、荷合供一瓶，亦奇觀也。⁸¹

我先君經商數十年，自是多家居。夕陽西下，樹影扶疏，軸掃落葉淪水煎茶，坐石上談家常事。吾家之井水絕甘，汲者投一錢，日可得百數十文。先君好讀春秋、戰國書及三國演義，所言多古忠義事，故余得之家教者甚大。其時我二兄已入泮。士大夫之來我家者，必竭誠款之。春雨之後，新筍怒生，斲而燒之，用以饗客，食者靡不稱美。或果實熟時，猥樹而摘之以餉客，客無不果腹者。余時雖稚少，顧讀書養花之外，不知有所謂憂患者。熙熙皞皞，凡五、六年，而余戾至矣。乙未六月二十有四日，先君見背。是時戎馬倥傯，既卜窆窆，而劉永福遁吾家，遂為軍隊所處。未幾，又為法院所買，改築宿舍，而余亦僑居城西矣。閱今僅二十年，而一過故墟，井湮木刊，尚認鉤（按，釣）游之處。追思少年時樂，何可多得！⁸²

這篇近乎小品文的敘記，正是一個人和特定區位（location）或建築物的某種關連，而有「我的」，不同於「你的」宣示意義，⁸³故而就題目而言，便已洋溢著地方感。連橫觸筆先寫故居地名的由來，進而描寫周遭環境，先賢如何引流為湖，依湖建亭；築小徑，入高堂。而父祖又如何種樹蒔花，他逐一列舉了這些花的名字，承接他的記憶。先賢父祖們，共同打造出一個既直於群聚閒話，又宜於獨坐安靜讀書的生活空間，樹影搖動，花香撲人之際，人我沉醉其中，而竹樹供竹筍，果樹有果實，皆足以為佳饌餉客。除了生活空間中素描，更有著人文活動的深描。他的兩位兄長已上學，家裡只有父親與他，父親在庭院內煎茶閒話日常的形影，對他講述故事啟發忠義思想的用心，以及時時到訪而受到款待的士大夫，使得整個生活空間顯得異常活絡。雖說當時庭院外的世界已遭遇劇烈的變動，但幼小的連橫仍然讀書養花，除此不知其他的怡然快樂。隨著父親去逝，劉永福來，又被日本政府徵收作為地方法院的用地。經二十餘年後，故居已不復可尋，連橫的偶然經過，不僅勾起少時的成長記憶，也逐一歷數時代的移易。地方建築的變動銘刻著時代的履痕，以及自我青春歲月的涓涓流逝，此一地方記憶之深度便因多方連結而獲得加強，也使得這一段書寫格外動人。可見若無實際常住的親身體驗，無法生產這段記憶，而最重要的，本文一開始即點出連橫自己的故居馬兵營是鄭成功駐節之地，呼應父親講述忠義故事，向讀者展示了連橫生命地圖的捲軸，銘刻著他對家國與文化的認同。而此一認同，又因著臺南為古

⁸¹ 連橫：《雅堂文集》（南投：臺灣省文獻委員會，1992），頁 87。

⁸² 同前註，頁 87-88。

⁸³ Tim Cresswell 著，王志弘、徐苔玲譯：《地方：記憶、想像與認同》（臺北：群學，2006），頁 6。

都，特別能顯示其滄桑。

至此，我們將深深明白，如果把空間當作一個生活的範圍，它將可以隨著交通工具的進步而不斷擴大範圍，卻不會注入任何情感連結，以至失去與人文意義的關聯。只有在空間納入地方之中，成為「身置其中」(in place)，方始能召喚(interpellation)出認識城市的觀點與記憶。連橫的臺南古蹟書寫，以古蹟為主要的地景媒介，以世變創傷、國族記憶、庶民生活等不同層次，凸顯出人與地方的聯繫，因之而發皇的情感，雖然並未能實質的抗拒日本政府的現代性建設導致城市樣貌的劇烈改變，但他的敘事再現卻阻遏了城市記憶全然消失，保存了地方特色與地方感，捍衛了包括連橫自己在內的「我們的」府城。而這樣視角聚焦、層次多重、關懷深沉、情感濃烈的書寫方式、觀察視角，與〈史跡志〉中的敘事，主題上雖然也在「臺南」這個地方交錯，卻仍然有相當程度的不同。

五、結語

本文有鑑於〈臺灣史跡志〉和〈臺南古蹟志〉對地理空間的書寫，為連橫重要的作品，卻罕見討論者。在此，遂以「地方」的記憶、想像與認同析剖其書寫。首先指出其地景敘事無論從創作緣起、敘事角度、內蘊意識等方面來看，皆可以溯源至被認為是北朝文學的雙璧的兩部地理書：《水經注》與《伽藍記》之上。他取法古人身歷其境的調查或以利用文獻、想像以診視山水的書寫技藝，對史跡、古蹟留下了珍貴的記錄，〈史跡志〉的描寫是區域性的面，而〈古蹟志〉則著重在具體的人文建築或設施，藉此完成他補正史之闕和「以為讀書稽古之助」的創作意向。

此外，不論在「城市關懷」抑或「場所精神」的面向上，我們發現，「在地情感」的體驗確實可以呈露作者一種觀看、認識和理解世界的方式。換言之，作為府城子弟的連橫，對其故鄉的描述，比較他對府城以外的臺灣史跡的書寫，除了跳脫一般知性文字的敘事手法，更灌注其主觀情感和地方認同的心理於其中。

這樣的書寫究竟有何意義？筆者從人文地理學的角度回答，在社會／地理的基礎上，事物自有其特殊秩序，在人的生活中不只對之發展認識，形成記憶，同時也銘刻意義與情感聯繫，此即地方感。惟，環境變遷造成地方的「流動性」，如史跡、古蹟隨著時間、市區改正或其他都市新地景的興起而圯壞之時，人的記憶以及因之產生的事物之意義，也將隨之而日漸消亡，地方感亦為之改變。則連橫在被收入此二志的書寫正是Tim Cresswell所說的「地方再現」，重建日常生活在一個「地方」的實踐，緣著書寫之再現，「地方」在消失的記憶中得以被留住。由於文化記憶對集體的主體同一性起著極其重要的作用，其是否被存儲、傳播，甚至是其呈現的方式，都會受到殖民統治者官檢的嚴格控制。對於此一

控制的反抗與把握，一方面意味著責任和義務，另一方面也意味著權力。二志中的書寫，不管是援引文獻、用詩截文以診視山水，或親歷其間的生活經驗或田野調查，都在為漢文化書寫爭取露出、傳承，並藉此強化地方、國族認同。而連橫以述作取法古人，絕不只是地理空間的書寫而已，他在通史、方言、詩史等不同方面的書寫，皆呈現他向中國古文化傳統取經的現象，它一方面代表了被殖民者臺灣人對殖民統治者對文化建構權力的爭取，表達了連橫向文化祖國「大傳統」的回歸，而呈現為單一的現代性。

但二志的書寫所產生的意義實際又不止於此。如前言所述，一〇年代中國五四運動所引動的整理國故的思維，對連橫產生了一定的影響，二志在展開史跡敘事時，大量講述民間風習民情，並引用庶人的詩歌、歌謠、故事，確認了文言文可以是鄉土敘事的載體，這些書寫暨其經驗在連橫所經歷的台灣話文、鄉土文學運動中為他打開話語空間，使他一方面增益〈史跡志〉條目的寫作，另一方面，則不斷以論述致力臺灣／臺南地景的經典化，鼓倡臺灣文人將之化入筆墨，避免從中國故實中做空洞的挪用，這可以說從地景空間的描述進入功能性的運用，確立了二志在地理空間書寫的特殊性。

引用書目

一、傳統文獻

〔北魏〕楊衒之著，楊勇校箋：《洛陽伽藍記校箋》，北京：中華書局，2006年。

〔宋〕蘇軾：馮應榴輯注，黃任軻、朱懷春校點：《蘇軾詩集合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

〔清〕王先謙合校本：《水經注》卷十八，北京：北京出版社，2000年。

葉百豐編著：《韓昌黎文彙評》，臺北：正中書局，1990年。

閔福德、劉紹銘主編：《含英咀華》（上卷：遠古時代至唐代），香港：中文大學，2001年。

二、近人論著

王允亮：〈《水經注》與南方文獻研究〉，《中國文學研究》3期，2010年。

江寶釵：〈日治時期臺灣文人對語言使用的主張暨其平議〉，《東吳中文系學報》26期，2013年。

——：〈向文化大傳統的回歸與變奏——連橫對臺灣古典詩「正典」的追尋〉，《東吳中文系學報》22期，2011年。

竹亭佐藤謙：〈明治己酉紀元節日設雅筵於知事舊館恭賦長句一篇聊以引諸士高吟云爾〉，《臺灣日日新報》，1909年。

吳天任：《酈學研究史》，臺北：藝文印書館，1991年。

段義孚（Yi-Fu Tuan）著，潘桂成譯：《經驗透視中的空間和地方》，臺北：國立編譯館，1988年。

胡適：《貞操問題（胡適文存／第一集·第四卷）》，臺北：遠流，1994年。

郝志群：〈關於《水經注疏》始撰起因及時間的探討〉，《文獻》3期，1995年。

連雅棠：〈聞南強鐵生芳園出獄走筆訊之〉、〈鐵生出獄以蟄龍吟寄余走筆報之〉，《台灣詩薈》第19號，1925年。

連橫：《雅言》，南投：臺灣省文獻委員會，1992年。

——：《雅堂文集》，南投：臺灣省文獻委員會，1992年。

——：《臺灣通史》，南投：臺灣省文獻委員會，1992年。

——：《臺灣詩薈》下冊，南投：臺灣省文獻委員會，1992年。

——：《劍花室詩集》，臺北市：臺灣銀行發行、中華書局經售，1960年。

- 陳夢林：《諸羅縣志》，南投：臺灣省文獻委員會，1992年。
- 陳橋驛：《酈道元與《水經注》》，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
- 曾迺碩：《連橫傳》，南投市：臺灣省文獻委員會，1997年。
- 程俊英譯注：《詩經譯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
- 廖炳惠：《臺灣與世界文學的匯流》，臺北：聯合文學，2006年。
- 劉大杰：《中國文學發展史》，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
- 鄭喜夫：《連雅堂先生年譜》，南投市：臺灣省文獻委員會，1992年。
- 諾伯舒茲著，施植明譯：《場所精神——邁向建築現象學》，臺北：田園城市文化公司，1995年。
- 錢大昕著，陳文和點校：《潛研堂文集》，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1997年。
- 霍華亮、劉鵬：〈酈道元生平簡介與《水經注》〉，《安徽文學》4期，2009年。
- 邁克·克蘭（Mike Crang），楊淑華、宋慧敏譯：《文化地理學》，南京：南京大學出版社，2005年。
- 羅聯添：〈李白《蜀道難》寓意探討〉，《唐代文學研究》（廣西壯族自治區出版）00期，1994年。
- 鐵生：〈滿庭芳雅棠發刊詩薈來書索詞填此以祝時適舊曆元旦也〉，《台灣詩薈》第2號，1924年。
- 酈道元原著，陳橋驛、葉光庭、葉揚譯注：《水經注》，臺北：臺灣古籍，2002年。
- 〈臺中通信（十五日發）雅人深致〉，《漢文臺灣日日新報》，1911年。
- 〈臺中通信（廿八日發）死生契闊〉，《漢文臺灣日日新報》，1911年。
- Alan Baddeley, *Essentials of Human Memory*. (Hove, England: Psychology Press, 1999).
- Tim Cresswell 原著，徐苔玲、王志弘譯：《地方：記憶、想像與認同》，臺北：群學，2006年。

A Discussion of Lian Heng's of Two Methods Writing

“Place” and Allegory:

Considering of A Record of the Vestiges of Taiwan

History and A Record of Tainan's Historical Sites

Chiang Bao-chai^{*}

Abstract

This paper observes why and how Lian Heng wrote *A Record of the Vestiges of Taiwan History* and *A Record of Tainan's Historical Sites* in two different ways. First, I point out that in terms of rhetoric, narrative, and inner consciousness, these works are imitative of two Chinese classics, *Commentary on the Classic of Waters* and *Buddhist Buildings in Luoyang*. Lian Heng models himself on the composition techniques employed by the earlier writers in describing their visits to the actual locations, or in their appreciation of landscapes in order to document Taiwan's historical relics and the historical sites of Tainan. What kind of motive is embodied in his writing? What is concealed behind the narration that produces the meaning of the locations themselves, or the temporal peculiarities of their background?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human geography, based on society and geography, things have their own unique order, and these take shape as memories in our lives, thereby enscribing their meaning. This is sense of place. However, changes in the environment create a “dynamism” of a place. Over time, as civic planning, or the appearance of new urban landscapes destroys historical sites, memories gradually disappear, and the meaning of place dependent upon them also changes. Thus, Lian heng's two records are exactly the kind of “re-presentation of place” described by Tim Cresswell. In practice, these records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Chinese Literature and Graduate Institute of Taiwan Literature, National Chung Cheng University, Taiwan.

rebuild the everyday life of places, and through the representation of writing, lost memories of 'place' are preserved. Furthermore, in order to canonize the landscapes of Taiwan, or Tainan so that they might be noted in the writings of élite literati and eventually become part of the history of landscape writing, it was necessary to make reference to the Great Tradition of Chinese culture.

Keywords: Period of Japanese rule, Lian Heng, Historical vestiges of Taiwan, Tainan historical sites, *Commentary on the Classic of Waters*, *Buddhist Buildings of Luoyang*

